张载的义理经学及其关学学统

朱 汉 民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长沙 414082)

摘　要: 宋学学派之一的张载之学,主要是通过诠释经典而展开义理之学的建构。张载的义理经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达到“乐天安命”目的而建构内圣之道,主要是以《周易》和《四书》为核心经典的义理之学;二是以经邦济世为目标而建构外王之道,主要是三《礼》为核心经典的礼义学与礼制学。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并创立的学派,是本义的关学;宋元明清陕西关中地域的儒学传统,是引申出来的广义关学。《关学篇》《关学续编》的“关学”是引申义的,作者基于历史编纂学目的,希望对关中地区乡邦文献人物作出全面整理。

关键词: 张载;经学;义理之学;关学;学统

中图分类号:B 2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3-0044-09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因长期寓居陕西凤翔府眉县横渠镇讲学,故被学者称为横渠先生。《宋史》记载,张载年轻时期受到范仲淹的引导,通过学习《中庸》而入圣门,到后来出入释老,最后返归《六经》之旨而创建宋学的义理之学。可见,张载的学术历程均是通过阅读儒家经典、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而完成的。张载的学术地位很高,被称之为北宋“五子”之一,也是两宋时期关学学派的创始人。

张载的义理经学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为达到“乐天安命”目的的内圣之道,主要是以《周易》和《四书》学为核心经典的义理之学;二是以经邦济世为目标的外王之道,其内容涉及三《礼》为核心经典的礼学(包括礼义与礼制的学说)。张载的义理经学,奠定了宋学史上著名的关学学统。

一、《周易》与《四书》的义理汇通

宋学首先是新经学思潮,张载创建的关学是宋学的著名学派之一,张载的所有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均是围绕经学展开的。王夫之认为张载之学涵盖了儒家诸经的内容:“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张载之学是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而建构起来的,而且,张载在《经学理窟》一书中,明确标榜自己的经学是一种“义理之学”的形态,他说:

> 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次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①

张载强调的儒家经学是一种“义理之学”,一方面要区别于汉唐经师“浅易轻浮”的章句训诂之学,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能够“通天下之志”的释老之学。张载认可的学术:“盖所以求义理,莫非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之事,心不弘则无由得见。”②张载数十年坚持对经典中义理的思考和探寻,使

收稿日期:2020-03-10
作者简介:朱汉民,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项目编号:19 ZDA028)。

①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273 页。
②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 276 页。

得朱熹表彰他的学术时说:“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①

张载的经学还以汇通群经为特色,这与他承担的学术使命是分不开的。《宋史》对张载的经学思想有一段评价:“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②张载的学术宗旨往往是以“乐天安命”为目标,故而他关注的经典首先是《周易》和《四书》,他进行的艰苦学术工夫集中体现在他将《周易》与《四书》的经典诠释结合起来。

学界曾经有过张载之学到底是易学还是《四书》学的讨论。③ 其实,张载的经学旨趣是以汇通为特色,《周易》学和《四书》学在张载之学中均很重要。一方面,张载的学术使命是要解决汉唐儒家“知人而不知天”④的弊端,故而需要以《周易》为经典依据,为新儒学建构起哲学深度的天道论;另一方面张载强调儒学“得天而未始遗人”⑤,故而特别关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道德义理,建构复兴儒家人文精神的人道论。而且,张载作为宋代新儒学的大家,特别需要将《周易》的天道和《四书》的人道论结合起来,即融合《周易》和《四书》而重建儒家的天人之学。

张载融合《周易》和《四书》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著作《正蒙》一书中。《正蒙》是张载晚年思想学术完全成熟时期的著作,张载自己认为:“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与! 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⑥这一部书是张载个人“致思之所得”的著作,其弟子苏昞“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⑦虽然本书从体例来说属于儒家“子学”类著作,但是从其学术渊源、思想内容来说,恰恰体现出张载将《周易》与《四书》的经典诠释结合起来完成义理建构的学术特色。

首先,《正蒙》集中表达了张载的易学思想。从《正蒙》的书名、篇名和学术渊源、主要思想来说,该书其实是张载解读《周易》义理的代表著作,特别凝聚了他晚年的易学思想。《正蒙》一书的名称就来自于《周易》,是张载依据对《蒙》卦卦义的理解,《象传》云“蒙以养正,圣功也”。张载解释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⑧同时,《正蒙》作为张载的重要易学著作,其中有《大易篇》《太和篇》《参两篇》《天道篇》《神化篇》《乾称篇》等,不仅仅是这些篇名全部是来自于《易传》,这些篇章的学术思想也主要是以易理建构起来的,《正蒙》一书中有大量条目与他早期著作《横渠易说》的表述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蒙》中的学术体系,确实包含着张载易学的基本内容。

当然,张载的易学还体现在他专门的易学著作《横渠易说》中,其学术思想正可以与《正蒙》相互补充。《横渠易说》主要是张载易学的一部笔记式的手稿,该书往往是有选择性地对《周易》经传加以注解,四库馆臣称“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所说,末卷更加不附载经文,载其有说者而已。”⑨但是,这毕竟是张载一部专门的易学著作,全书体现出张载以易理建构“天人一源”之学的学术追求,譬如:

> 《易》之为书与天地准。易即天道,独入于爻位系之以辞者,此则归于人事。盖卦本天道,三阴三阳一升一降而变成八卦。错综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动静,故系之以辞,存乎教诫。使人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

---

① 黄宗羲、全祖望:《横渠学案下》,《宋元学案》卷 18,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774 页。

② 《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 386 页附录。

③ 参阅龚杰:《张载“四书学”的学术价值》,《西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第 90—95 页;王利民:《论张载之学是易学》,《周易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51—58 页。

④ 《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 386 页。

⑤ 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 65 页。

⑥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 384 页附录。

⑦ 苏昞:《正蒙序》,《张载集》,第 3 页。

⑧ 张载:《横渠易说·上经·蒙》,《张载集》,第 85 页。

⑨ 《四库全书总目·横渠易说提要》,《张载集》,第 414 页附录。

避,《易》之义也。①

从张载对《周易·系辞传》的“说”中可以看到,他对《易》义的思考,重点在“易即天道”的宇宙本体论建构,然后他会进一步从天道转入人道,进而从事“归于人事”的人道思考,而《正蒙》恰恰是张载这一思想追求的完成。

所以,从张载的《正蒙》中可以进一步探讨他的《四书》学。张载要建构新儒家“得天而未始遗人”的义理体系,特别需要将《易》学与《四书》学结合起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早期儒家人道论的核心经典,《四书》的集合与命名是朱熹通过《四书章句集注》得以完成的。但是,朱熹之前的北宋理学家如张载、二程等对《四书》学的兴起、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正蒙》一书正是张载《四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张载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明确的认知。他坚持认为:

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②

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一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③

所以,张载《正蒙》一书在论述天道论之后,接着就是《诚明篇》《大心篇》《中正篇》《至当篇》《作者篇》《三十篇》《有司篇》等论述人道论的篇章,主要内容均是源于《四书》学。其中的许多篇名就来自于《四书》,如《诚明篇》《中正篇》来自《中庸》,《大心篇》来自《孟子》,《三十篇》来自《论语》的“三十而有志于学”。可见,《正蒙》一书与《四书》相关的篇名还多于《周易》。

张载为了解决秦汉以来儒家学者“知人而不知天”的弊端,通过《周易》诠释而建构天道论,但是作为一个与佛老之学论战的儒者,他最终目标仍然是人道建构,所以他必须将《周易》的天道义理落实到《四书》的人道义理。《正蒙》在阐发《四书》的做人之道时,总是将二者结合起来:

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四十精义致用,时措而不疑。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

穷理尽性,然而至于命,尽人物之性,然后耳顺;与天地参,无意、必、固、我,然后范围天地之化,从心而不逾矩;老而安死,然后不梦周公。④

我们看到,《论语》中有孔子自述其三十而立至七十的人生精神历程,提出人应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德修养,而张载将这些做人的道理提升到超越的天道,与《周易》的“与天同德”“穷理尽性,然而至于命,尽人物之性”“范围天地之化”等天道论结合起来。张载这一种将《周易》天道论与《四书》人道论结合,成为他建构性理之学的一种普遍性方法。如他提出“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⑤这就是将《易传》的“尽性以至于穷理”“穷理以至于尽性”与《中庸》的“自诚明与自明诚”结合起来。所以,将《正蒙》看作是宋儒《四书》学重要著作也有一定理由,因为它体现了张载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思想的发展。

由此可见,面对佛老之学在人生哲学领域的挑战,张载的义理经学首先是要解决“乐天安命”的问题,故而必须将天道论的《周易》学与人道论的《四书》学结合起来,以解决他面临的“儒家自有名教可乐”的思想挑战,从而建构出新儒学的义理之学。

---

① 张载:《横渠易说》,《张载集》,第181—182页。
②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277页。
③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272页。
④ 张载:《正蒙·三十篇第十一》,《张载集》,第40页。
⑤ 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下》,《张载集》,第330页。

二、三《礼》学的礼义与礼制

张载的义理经学不仅仅是关注“乐天安命”,致力于内圣之道的建构;他还特别关注“尊礼贵德”,致力于外王之道的建构。张载希望通过三《礼》研究而从事宋代礼仪制度建设,以解决经世致用的实际需要。《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丧祭葬,率用先王之意,而传以今礼。又论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里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①所以,张载的义理经学还具有十分鲜明的经世致用特色。在张载的著述目录中,涉及礼学范围的十分广泛。譬如,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一书中,就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同时,张载《经学理窟》中还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等篇。另外,张载还著有一些重要礼学著作如《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等,尽管其中许多均已散佚,但是看得出来,三《礼》学在张载的经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②本来,在儒学思想体系中,既有属于经学的《礼》学,也有属于典制之学的礼学。由于张载“以礼立教”③的学术追求,使得他对三《礼》学及其礼义与礼制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张载对三《礼》的关注和重视,首先体现在他的礼义的研究中。在早期儒家《礼》经及其传记中,对礼的来源、意义做过许多论述,其实这些礼义的论证与礼仪的制定有密切联系。而张载关于礼义的论证,与他“天人一源”的义理之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载说:

> 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④

将礼的来源归之于“天”,是早期儒家的思想观念。但是《六经》元典说到礼源于天时,往往是强调“天”的主宰意义而言,而张载论证理源于天,却是太虚本体化生的自然过程,是人对“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的遵循。这样,张载就将人文的礼义与天道的自然统一起来,人文价值、社会礼义均源于天道自然、太虚本体。

早期儒家还提出礼源于人之性情的观点,为礼的价值和意义确立了人性论的基础,张载继承了早期儒家的这一思想,但是将其纳入他的太虚本体的宇宙论之中。张载认为,人性源于天性,天性即太虚之本体,虽然他同样以人性作为礼的价值依据,但此人性又具有了超越性太虚之本的意义,即如他说:

> 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⑤
>
> 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⑥

张载认为,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其实是依人的性情而建立起来的,故而礼具有使人回归本性的作用。根据张载的礼学,礼源于人之本性,其实就是源于太虚之天;同样,人遵循社会礼仪,同样是为了回归人的心性本体,进而返归太虚之天。因此张载的心性论不仅仅是确立礼义的人道依据,同时也是其工夫论的依据。在张载的修身工夫论体系中,他总是将内在的“虚心”与外在的“行礼”结合起来,他将其称之为“合内外之道”,他说:

> 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⑦

---

① 《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 386 页附录。

② 林乐昌:《张载礼学论纲》,《哲学研究》2007 年第 12 期,第 48—53 页。

③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 1,《二程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1195 页。

④ 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 264 页。

⑤ 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 264 页。

⑥ 张载:《经学理窟·气质》,《张载集》,第 265 页。

⑦ 张载:《经学理窟·气质》,《张载集》,第 270 页。

在张载的礼学思想中,礼是能够将天与人、内与外均连接起来的关键,人的修持之道,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身,还是将日用伦常与超越精神统一起来的路径。道德礼义不仅仅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同时还是一种天地秩序的体现,即所谓“除了礼天下便无道矣”。

张载的礼学思想不仅仅是论证“礼”的来源与依据,更加重要的是将礼看作是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生活实践的规范准则。这样,张载关注的“礼”就由“学”转为“政”,即如他所说:

> 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便无道矣。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五常出于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为,但不知耳。①

张载一方面关注礼的形上依据,对“无体之礼”“礼之原在心”作了形而上的思考;他另一方面关注礼的政治制度、生活实践,将礼看作是一切国家典章、社会生活的规范制度。

《宋史》记载,宋神宗召见张载并问其关于治道的见解,张载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②在张载有关“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中,包括了封建的政治制度、井田的经济制度、宗法的社会制度,而其最重要的则是礼制,因为礼制是合政治、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制度体系。张载一直将礼制看作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根本。张载有关“三代之治”的建议并不完全是一种思古的幽情,而是基于现实的原因。譬如他提出的“封建”,就是试图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有效地扩张地方政治权限,来抑制或平衡过于强势的中央集权对地方活力的伤害。③ 他提出恢复井田制是因为,宋朝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朝廷又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广大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地或者少地的人,使得贫富分化对立更加严重。井田制通过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重新分配,以解决土地兼的严重问题。张载还认为封建、井田是密切相关的,他说:“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④张载进一步指出后世封建、井田、宗法之所以遭到破坏,其实均是秦制造成的恶果,他在诗中写道:“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萧从此法相沿。生无定业田疆坏,赤子存亡任自然。”⑤可见,张载提出效法“三代”之制的方案,其社会政治内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张载与许多其他的宋儒一样,他们倡导以封建制、井田制、宗法制的“三代”政制,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但是在现实政治领域,他们均面临诸多的实际困难,更不能够得到朝廷的真正认可和实际支持。事实上,张载与主持熙宁新政的王安石政见不合,故张载希望通过自上而下路径而推进“三代之制”完全不可能。

张载及其弟子放弃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他们改为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的礼制建设,并希望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张载努力在民间社会推动以宗法为基础的礼制与礼教,但是要如何才能够推动民间礼教?张载认为必须在民间社会从事宗法制度的恢复和建设,因为宗法本来就是礼制的基础和依据。张载特别强调宗法制度的重要,他说:

>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⑥

张载在担任地方官时,就十分重视礼教,希望通过礼义教化而移风易俗。特别是张载退居故里之后,他更是将推动地方礼教作为自己经世的主要目标。据吕大临《形状》介绍,张载对关中地区“学者有问,多

---

① 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 264 页。

② 《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 386 页附录。

③ 参阅范立舟:《张载的“封建”构思及其政治理想》,《中国哲学史》2019 年第 1 期,第 54—62 页。

④ 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 251 页。

⑤ 张载:《文集佚存·杂诗》,《张载集》,第 367 页。

⑥ 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 258—259 页。

告义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①在张载的推动下,以宗法为基础的礼教发生了很好的效应。据张载自己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②当时学者也表彰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③

张载对礼义教化、移风易俗的重视,不仅对关中地区的礼义教化有极大推动,而且也对他的弟子们的思想和实践产生很大影响,使之成为关学学派的一个重要学术特质,进而成为关中地区的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传统。张载的著名弟子吕大均等受到张载礼教思想的熏陶,率领宗亲乡党制定乡约、乡仪,著有《吕氏乡约》《吕氏乡仪》各一卷。吕大均等主持制定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乡规民约,它不仅对关中地区民间社会的礼教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全国其他地区还具有突出的示范效应。《吕氏乡约》其实就是一个推动乡村礼义制度建设的范本,该《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将儒家的道德礼义与民间乡村的风俗制度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吕大均还有《吕氏乡仪》,该《乡仪》以《周礼》经典为范本,将原本是西周的国家制度、贵族礼仪的吉礼、嘉礼、宾礼、凶礼,作为民间社会、乡村宗族的礼仪制度。可以将《吕氏乡约》《吕氏乡仪》看作是张载及其关学学派在推动民间社会礼制、礼教的具体落实。吕大均率宗亲乡党制定的《吕氏乡约》《吕氏乡仪》,对关中地区的礼义教化产生很大影响,使得“关中风俗为之一变”④。

三、关学学统的双重意义

张载与其他宋学学者一样,一生以经世、讲学两事为其毕生使命。就经世而言,张载自从嘉祐中进士以后,曾经在多地做过不同职务的地方官员。后因御史中丞的推荐,一度应诏入京城,但是因张载的政见与王安石不合,故而他很快离京回归横渠故居。再就讲学而言,张载中进士后也曾经在地方担任州郡学官,他曾“多教人以德”,留下很好的声誉。但是他的最重要活动则是在他非职务行为的讲学活动。张载回归家乡横渠镇,潜心从事学术与教育,这成为他创建学派的黄金时段。《宋史》有记载:

> (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⑤

张载讲学故居横渠,从学者甚众,著名者如吕大忠、吕大钧、吕大监、苏昞、范育、薛昌、种师道、游师雄等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张载为核心的地域学派。张载以及他创建的学派在宋学史上独树一帜,为新儒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宋学史的发展。

张载以及他创建的学派显然不同于作为官学的荆公新学,主要是一个创建于横渠、并以民间讲学方式而建立的地域学派,即如《宋史》所说:“(张)载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横渠先生。”⑥故而宋代开始以地域命名张载的学派。最早称张载的学派为“横渠之学”,如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⑦杨时认为张载源于程氏是不准确的,但是他称名“横渠之学”,并肯定张载是“关中诸生”的宗师、“欲自为一家”,则道出了这一地域学派形成的历史事实。所以,南宋初

---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 383 页。
② 张载:《张子语录·后录上》,《张载集》,第 337 页。
③ 张载:《张子语录·后录上》,《张载集》,第 336 页。
④ 冯从吾:《关学篇》卷 1,《和叔吕先生》。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附录卷五》,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 页。
⑤《宋史·张载传》,《张载集》附录,第 386 页。
⑥《宋史·张载传》,《张载集》附录,第 387 页。
⑦ 杨时:《跋横渠先生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龟山集》卷 26,《文津阁四库全书》1129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342 页。

期,学界均肯定了这一地域学派的存在。如胡宏说:“我宋受命,贤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①胡宏首次将周、邵、二程、张五位北宋的道学家并举,即后来常说的“北宋五子”,他们创建的均是地域性学派,胡宏以“秦中”称张载的学术地域。此后,吕本中才正式称张载之学为“关学”。据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的“按语”中引吕本中之语中有“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泰山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大之。”②此后,“关学”开始被普遍接受成为张载之学作为地域学派的称呼。由于宋代儒学的不同学派大多数是不同地域学术,故而元明时期还普遍出现了“濂洛关闽”的提法。从《元史·刘因传》,到《明史·解缙传》,均有以“濂洛关闽”的专门名称。“关学”之名出来以后,很快就流传很广,但是,“关学”概念在流传中其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全祖望描述的北宋庆历是宋学初兴之时,各个地域均开创了自己的学统,包括齐鲁、浙东、浙西、闽、蜀、关中等地,形成了“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③的局面,宋代学统的地域化形态,以及关学兴起而形成的关学“学统”,推动了宋学的发展。我们发现,宋学史上所谓的地域“学统”,其本义就是地域学派。但是明清以后,这些地域学派观念衍化为广义的地域学术概念。“关学”一词也是以双重意义被广泛使用。

第一,本义的关学,就是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并创立的学派。张载之学在北宋时期即闻名一时,南宋时期即出现“关学”之称谓,后来一直延续至元、明以后。明太祖洪武年间,大臣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④明陈鼎亦说:“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⑤这里所言的关学,则均是指以地域命名的张载学派。所谓关学,甚至可以就看作是张载之学,濂、洛、关、闽,亦可看作是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代称,如明初宋濂有“濂洛关闽四夫子”的说法,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这是关学之名的本来意义,具体就是指张载所创立的理学学派。

第二,引申出广义的关学。明代学者冯从吾于明万历年间编有《关学篇》一书,溯源孔门的关中弟子、上起于北宋张载,下至于明代王之士,共收录宋元明时期关中的理学家三十三人。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继续作《关学续编》,将“关学”学者名录进一步拓展。显然,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所言的关学,已经大大突破北宋时期以张载为代表的地域性学派的含义,而是指关中地域儒学学术史的概念。我们看到,冯从吾的《关学篇》,就是从孔门的关中弟子秦祖、子思等人开始,并延续到宋、金、元、明几朝的儒家学者。而清代王心敬的《关学续编》,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的《关学篇》五卷提要所说:“于秦祖之前增伏羲、泰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六人;于汉增董仲舒、杨震二人;明代则增从吾至单允昌凡六人。”⑥这里所言的“关学”,虽然仍然包括张载的关学学派在内,但是其外延大大扩展,已经将与关中有关的三代圣王、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代理学、明清理学或心学均收录进来,完全是作为地方学术史概念的“关学”。这里的“关学”其实就是指历代陕西关中之地的儒家学者,只要是出身于关中,或者与关中地区有关的儒家学者,均可以列入《关学编》。所有列入《关学编》的学者,他们之间并无学术授受关系,也没有相同的学术思想,更没有一致的学术宗旨。我们认为,不能够将引申义上的关学史看作是学派史,而是乡邦文献整理类型的地域儒学史整体。

其实这是两宋时期地域学派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地域学派的形成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形成自己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一个学统上有传承、学术上较一致的学者群体。宋代的濂学、洛学、蜀学、关学、闽学、湖湘学、浙学之所以均是独立的地域学派,就在于他们均有学派具有的上述

---

① 胡宏著:《周子通书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62 页。
② 黄宗羲、全祖望:《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 6,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61 页。
③ 黄宗羲、全祖望:《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 6,第 251 页。
④ 张廷玉:《解缙传》,《明史》卷 147,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4116 页。
⑤ 陈鼎:《高攀龙传》,《东林列传》卷 2,《文津阁四库全书》第 456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682 页。
⑥ 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附录》卷 5,第 630 页。

两个条件。学术史名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亦往往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考察地域学派的。如果将宋元明清所有关中理学家均归为一个学派的关学,既不能够确立他们之间相通的学术思想,也不能够真正展示学术传承的脉络,把握一个学派的共同学术特征。宋以后,学者们以地域命名学派是一个普通现象,而继地域性学派名称出现之后,往往会进一步形成以此地域学派命名的地方学术史或地方文化。譬如,“关学”既可能是指本义的宋代地域学派,也可能是指引申义的地域学术历史整体。不仅仅是关学,其他地域学术形态也是如此,如本义的“蜀学”是指北宋时期三苏为代表的宋学学派,而后来又引申出广义的“蜀学”,指四川地区学术史的整体;本义的“湘学”“湖湘学”是指南宋时期胡宏、张栻为代表的理学学派,而后来出现了广义的“湘学”“湖湘学”,则是指湖南地区学术史的整体。本义的“浙学”可能是指南宋陈亮、叶适等为首的事功之学,而引申出广义的“浙学”也是指宋元明清浙江一带的地方学术史整体。由此可见,在学统四起的背景下,宋代许多学派的名称均开始于本义的地域学派,但是后来又演变为广义的地域学术史,以至于许多学术史的研究者往往是将此二者混同起来。所以,我们需要以“关学”为例,进一步探讨地域学派之名如何演变成为一种地域学术史命名。

张载创立的关学学派,在北宋时期影响很大。正如冯从吾所说:“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眉邑,倡明斯学”①,但是,在张载逝世之后,关学的地位和影响大大下降。一方面,张载的弟子在学术界影响力不是特别高;另一方面,张载的部分弟子转到程门洛学之学,关学思想在发生演变。加之完颜之乱,使得关学一度后继无人,所以全祖望感叹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②

明清以来,关中地区的儒学学术又开始有沉寂走向兴起,出现了不少具有学术造诣、拥有一定学术声望的学者。但是,明清时期的官方学术主流是程朱理学,而民间学术主流则是阳明学、甘泉学,另外还可以加上兼容程朱理学与王湛心学的学派,可见,关中地区的儒学学术恰恰是以上述官方或民间的不同学术思潮、学术流派的汇集。从他们的学术体系、学术观念来看,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学者差异很大,他们往往是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甘泉心学等不同学派的学术追随者和思想倡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再将从北宋到明清时期的陕西关中之学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难以说得通的。

但是,宋元明清的关学学者虽然不是一个学派,却是一个共同地域学术背景、学术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学者。当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在编撰《关学篇》《关学续编》时,将从北宋到明清时期的陕西关中地区的数十名儒学学者统统列入,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关中学者无论是传承当时哪一流派的学术,统统均可以纳入“关学”的群体中来。显然,这一种“关学”地域命名,既包含着历史编纂学对乡邦文献整理的需求和方便,但同时确实又有着地域学术传承、地域文化建构的意义。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从事地域学术史、文化史不能够忽略的。梁启超先生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与环境者益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③《关学篇》《关学续编》的编撰就是出于这一种“恭敬桑梓的心理”,编撰者希望以此“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来鼓舞后学,故而将这些不同学术思想的乡贤统统纳入《关学篇》之中。但是,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关中学者确实大多对北宋张载等“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充满敬仰,他们在追随其他不同学术流派宗师的同时,仍然还可能受到北宋张载的关学学术传统影响。

考察明清时期关中学者会发现,这些源于不同学术流派的儒家学者或“理学”思想,或许从整体而言,他们的学术思想十分多元化,完全不是一个学术流派,但是他们还可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乡邦的

① 冯从吾:《关学篇序》,刘学智编:《冯从吾集》卷12,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1—232页。
② 全祖望:《宋元儒学案序录》,《宋元学案》卷首,第6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339页。

关学领袖张载的人格与思想均非常推崇。张载及其关学学派的学术成为明清关中学者的重要思想渊源,是这些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学术思想相通的地域学统背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关学篇》《关学续编》记载的数十位关中学者理解为关学的广义“学统”,广义关学学统包括北宋横渠学派而不等于横渠学派。正如清人熊赐履《学统》一书,将孔子以来能列入儒家学统脉络的学者作一“学之源流派别”的罗列,显然,这一“学统”是比学派外延更加广泛的概念。

我们强调宋元明清陕西关中地域形成的儒学传统,是引申出来的广义关学,这是包括许多不同学派在内地域学术整体。譬如说,明代关中学者的学术思想十分多元化,其中薛敬之、吕柟传承薛瑄之学而“恪守程朱”,南大吉、冯从吾追随阳明心学以致良知为宗,可见明代关中儒学有着多元的学派思想。但是元明清关中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地域学统背景,即对张载之关学有着特别的尊崇。所以,吕柟在讲程朱理学、薛瑄之学的同时,又继承张载的关学思想渊源,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吕柟》所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①可见,吕柟虽然在学术上,可以纳入程朱学派,但是在广义的学统上,仍然明显继承了北宋关学的一些重要学术传统,故而有广义学统的历史渊源。冯从吾虽然尊崇阳明心学,但是他对张载的关学学统念念不忘,故而花了大量精力,编撰《关学篇》,表明了他对张载的关学的推崇和继承。他将明代关中之学的重兴看作是对“直接横渠之传”,他说:“而关中之学益大显于天下。若夫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则宗伯尤为独步者也。”②他也认为北宋时期的横渠之学,已经成为关中地区儒学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学术资源,尽管他本人是阳明心学学派的学者。

ZhangZai's Normative-Principle-Based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Scholastic Orthodoxy of the Study of the Guanzhong School of Thought

Zhu Hanmin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Zhang Zai's(张载)special form of thought was centered around the exegesi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constituting his own school of thought within the broader scholarly landscap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宋学), which was constructed as a school of thought based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al canon and focused on the notion of the normative principle(义理). Hi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based on the normative principle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ts first part wa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y for inward cultivation as a sage with the aim of "engendering heavenly delight and contentment with one's destiny". This was a type of study based on the normative-principle which took the *Book of Change*(《周易》)and the *Four Books*(《四书》)as its central canonical works. Its second part wa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y for outward supremacy as a king with the aim of "ruling a country and protecting its people". This was a type of study regarding the ritual system and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it, taking *the Ritual of Zhou*(《周礼》), *Ceremony and Ritual*《仪礼》and *the Book of Rites*(《礼记》)as its central canonical works. The term "study of the Guanzhong School of Thought"(关学)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specific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was formed by Zhang Zai in the course of his scholarly activities and later outreached in the Guanzhong(关中)region of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term was eventually extended in scope, however, to refer to the Confuian tradition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in a broader sense as it existed throughout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erm "study of the Guanzhong School of Thought" from the two books entitled *A Study on the Guanzhong School of Thought*(《关学篇》)and *A Further Study on the Guanzhong School of Thought*(《关学续编》)was of extended meaning. Based on historical compilation science, the authors of the two books were intende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philological collation and record of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and personage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Key words: Zhang Zai(张载),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of the normative principle, study of the Guanzhong School of Thought(关学), scholastic orthodoxy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② 冯从吾:《关学篇序》,《冯从吾集》卷12,第232页。